十年来清代边疆开发史研究概况

冷　　土

有清一代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既是边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项研究活动的发轫，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产生一批有影响的早期成果。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却显得相对沉寂，未能持续展开。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边疆地区开发热潮的蓬勃兴起，上述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各地对距今天较近，能够直接提供历史借鉴的清代边疆开发史，予以高度重视，有关研究机构和部门以这一领域为对象，相继组织队伍，设立课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究，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清代边疆开发史作为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的分支学科，正在逐步形成，日趋兴盛。

1980—90年的十年中，涌现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内容涉及清代边疆开发的 各 个 方面，显示了相当开阔的研究视野，多数课题具有开拓性，填补了以往的空白，有些成果已具有相当深度。本文将上述论著区分为一、清代边疆开发的总体研究；二、农（牧）业、屯垦研究；三、工矿业、商业贸易、城镇及交通研究；四、人口迁移、遣犯流人及生态环境与边疆开发之关系等四个方面，作一概略的介绍。

一、边疆开发的总体研究

清代边疆开发史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戴逸《加强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6.5），马汝珩《清代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及意义》（《清史研究通讯》1988.3），马大正《深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之管见》(同上)，从宏观上阐明了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内容、意义和方法。戴文强调，“在边疆开发史研究中还应当特别重视清代和近现代。这段历史离开我们的时间最近，和现实的关系最为密切。边疆的今天是昨天发展来的，今天的许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追根溯源，都要返回到清代和近代。因此，只有研究清代和近代边疆开发的情况，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边疆的现状”。戴逸在《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人和环境》（《清史研究通讯》1988.3）一文中对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中人类的开发方式，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作了探讨，认为环境和人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应当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种种规律加深认识，加强研究。成崇德《对清代边疆开发史中几个问题的认识》（《清史研究通讯》1988.3），钟祥财《试论中国历史上开发边疆的经济思想》（《青海社会科学》1985.6）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开发边疆的思想和认识。

清代边疆地区，习惯上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滇桂、台湾、海南及南海诸岛等地区。赵云田《清朝统治蒙古经济政策管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4）一文从畜牧业、农业、贸易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清政府统治蒙古的经济政策及其在促进蒙古地区开发上的

积极作用。马汝珩认为清代内外蒙古地区的开发是与清朝政治局面稳定，政府的一系列生产措施相联系的（《简明清史》第 2 册，219页）。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开发成就显著，近年来，对新疆地区开发史的研究成果斐然。殷晴《新疆开发建设的历史考察》（《民族研究》91.1），纪大椿《论松筠》（《民族研究》1988.3），张羽新《清朝统一新疆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主要措施》(《新疆社会科学》1983.1)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有清一代新疆开发的历史过程及意义。有清一代西藏经济开发远不及其他边疆地区，历史学界对西藏社会经济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成果尚不多见。黄奋生《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年），张羽新《清代前期西藏地方经济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西藏研究》1983.2）就西藏社会经济的特点，制约西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探讨。台湾的开发，是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用力较多的热点。陈元熙、施满玉《明清时期台湾开发述略》（《福建师大学报》1979.4），范东升《浅谈清初海禁对台湾开发的作用》(《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3)、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3），等论文对明清之际及清统一台湾后的经济开发政策、禁海、开海政策作了探讨，论述多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郑成功统治时期台湾的开发，论文有陈元熙《郑成功对发展台湾经济的贡献》（《福建师大学报》1982.2)、雷建云《郑成功对台湾的经济开发》（《黔东南社会科学》1989.4）等。第二. 清朝统治时期台湾的垦殖。近年来史学界对清朝统治初期台湾开发的评价说法不一，展开了讨论，比较多的研究者认为，康熙统一台湾后，促进了台湾的开发，特别是垦殖事业，发展较快。持此论者有朱诚如《康熙年间台湾的进一步开发》（《辽宁师院学报》1979.4）等。也有的论者，对清初台湾开发的政策持保留态度，如潘君祥《论康熙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中国农史》1983.2）。第三，清代台湾高山族经济的发展。高山族人民与汉族移民一起为开发台湾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论文有王政尧《康雍乾时期汉族、高山族友好关系的发展及其原因》（载《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国强《康熙时期台湾高山族社会发展状况《（《民族研究》1984.3），郭志超《清代汉族影响下高山族农业技术的变革》(《台湾研究集刊》1985.1）等

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的开发研究。马东玉《冯子材与海南岛开发》（《光明日报》1987年12月9日），杨东梁《张之洞与海南岛开发》（《清史研究通讯》1988.3）分别对张之洞，冯子材开发海南岛的功绩作了评述。何瑜《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的比较研究》（《学术研究》1988.2）与《清代海南开发迟缓原因探析》（《清史研究通讯》1988.3）是海南岛开发史研究的两篇力作。该文认为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清朝政府消极的治琼政策，及脆弱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开发方式使海南岛的经济开发远远落后于台湾。南海诸岛中西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中国人民很早就在这里航海、居住、开发，吴风斌《宋元以来我国渔民对南沙群岛的开发和经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1）和何纪生《海南岛渔民开发经营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功绩》（《学术研究》1981.11）均是这一命题中值得一读的研究之作。

二、农牧业、屯垦研究

边疆地区因各自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地理位置不同，有清一代的土地开垦也有较大

的差异。

东北地区。对东北地区垦荒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一、清前期封禁政策对开垦的影响；二、东北三省的土地开发。

清朝在东北推行封禁政策是研究土地开垦中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此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马越山《清代东北的封禁政策》（《社会科学辑刊》1986.3），曲淑珉《清代东北封禁政策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2），张璇如《清初封禁与招民开垦》（《社会科学战线》1983.1）等论文对封禁政策的利弊作了评述。

孙占文《清初黑龙江地区土地开发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1），《清初、中期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北方论丛》，1981.1）和《清末黑龙江省的土地开发》（《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1984.3）三篇论文比较全面地勾勒了有清一代黑龙江土地开发的全貌。研究吉林省土地开发的论文有孟东风《清代初中叶吉林地区的土地开发》（《吉林师大学报》1990.2），刘洁《清代延边地区的农业开发》（同上），刁书仁《嘉道时期双城堡，伯都讷屯垦论略：兼论流民对吉林的开发》（《清史研究通讯》1990.3）等。衣保中《清末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近代化》（《辽宁师大学报》1989.2），乌廷玉《清前期奉吉两省私有土地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89.1）等论文对清代辽宁省的农垦发展作了探讨。

内外蒙古地区。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习俗决定了这里的开发特点，即由单纯游牧业向以畜牧业经济为主，多种经营并存转变。在转变过程中，保护畜牧业经济，发展农业经济是必要的手段。史学界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探讨。

首先，总结清前期牧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邢亦尘《清代蒙古族游牧经济浅议》（《蒙古族经济发展史》第1集，1987年）对清前期牧业经济的复苏和高度发展的原因作了探讨。陈安丽《清代太仆寺左右翼牧厂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8.2）对官办太仆寺牧厂的牧业发展状况作了翔实的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其次，研究蒙古地区农业的发展。近年来又有一批论文从多种角度探讨这个问题，如马永山《论清王朝在内蒙实行的农业政策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1），杨亚军《清代内蒙古地区农业发展浅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6）等。又如，对不同类型地区的开垦活动的论述：田志和《清代科尔沁蒙地开发述略》（《社会科学战线》1982.2），《清代东北蒙地开发述要》（《东北师大学报》1984.1），《东北蒙地开发中的矛盾和斗争》（《东北师大学报》1986.4），《论清末东部蒙旗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北方文物》1987.2）四篇论文探讨东北蒙地开发的特点。王玉海《清代喀喇沁地区的土地租典问题》（《蒙古史研究》第三辑）较深入地论述了农业化过程中的土地租典问题。归化城土默特与河套地区土地开垦的论文有云慧群《清代土默特农业的发展和蒙汉民族关系的加强》（《内蒙古师大学报》1987.2），张植华《清代河套地区农业及农田水利概况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4），袁明全《清代河套农田水利发展述略》（《中国农史》1987.4）等。

清朝在进兵新疆初期及统一新疆以后，对该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活动。各种形式的屯垦是清代新疆开发史研究的重大课题。新疆的屯田主要包括军屯、民屯、回屯、遣屯等。

军屯研究的论文有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兵屯》（《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13），华立《道光年间天山南路兵屯的演变》（《新疆社会科学》1988.2），齐清顺《试论清代新疆兵屯的发展和演变》（《新疆大学学报》1988.2），等。上述论文对新疆地区的兵屯进行了比较

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兵屯的形成，组织形式，种地亩数，旗屯的形成及历史意义方面研究都比较深入。

民屯、回屯研究的论文有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1985.2)，王希隆《清代新疆的回屯》(《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1),蒋其祥《略论清代伊犁回屯》(《新疆大学学报》1984.3)等。徐文着重对民屯的形成，民屯的各种制度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探讨。王文论述了回屯的组织，经营方式、隶属关系。

清代新疆屯田方面的文章较多，还有戴良佐《清代木垒屯田概况》(《新疆师大学报》1985.2)，吴元丰《清乾隆年间伊犁屯田述略》(《民族研究》1987.5)，王建民《清乾隆时期新疆屯田分布状况初探》(《西北史地》1984.1)等。王希隆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使用资料比较完整，论述比较系统的屯田研究的新作，值得一读。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边疆地区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新疆的屯垦史出现了两个重要历史人物，即林则徐和左宗棠。近年来发表了一些论及林则徐与新疆屯垦的文章。《林则徐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一书刊载了纪大椿、周轩、华立、陈胜粦、郭小东，严晓达等人的论文，对林则徐顺应开发新疆的历史发展趋势，积极推动当地的屯垦，水利事业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同、光年间，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时，也注意新疆的屯垦，有关论文有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社会科学》1984.4)，沈其新《左宗棠西北屯田中土地改革思想述略》(《湖南师大学报》1985.6》)。

其它边疆地区的屯田研究还有李家瑞《清代川西北藏族地区的土屯制与屯田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4)，李炳东《清代前期广西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广西大学学报》，张雪慧《清代海南黎族的土地典卖契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司徒尚纪《刀耕火种在海南岛的历史演变争议》(《热带地理》1987.3)等。

三、工矿业、商业贸易、城镇和交通研究

有清一代边疆地区的工矿业发展，可以鸦片战争为界，之前主要以采矿业、传统手工业为主，之后才有近代意义工业出现。下面分别概述。

云南的矿冶业在清代前期社会经济中占有显著地位。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地深化。论文有彭雨新《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探讨》(《武汉大学学报》1984.5)，龚荫《清代滇西南边区的银矿业》(《思想战线》1982.2)，文思启《林则徐与云南矿冶业》(《思想战线》1985.4)，潘向明《评清代云南的“官治铜政”》(《清史研究通讯》1988.3)，况浩林《鸦片战争前云南铜矿生产性质再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4)等。清代前期矿冶业的发展并不局限于云南，傅笑枫《清代东北矿业》(《北方文物》1989.2)，江桥《清代归化城地区煤炭开采及其特点》(《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3)，王致中《清代新疆矿业述略》(《社会科学》1986.6)和李炳东《清代前期广西的矿冶业》(《广西大学学报》1980.1)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

孙克复《李金镛与漠河金矿》(《黑河学刊》1983.3)，吕一燃《沙俄与漠河金矿》，刘家磊《近代漠河金矿》(均载《瑷珲历史论文集》),王革生《清代漠河金矿》(《黑河学刊》1984.1)等论文分别论述了漠河金矿创建，以及围绕漠河金矿利权展开的中俄交涉始末，

刘铭传于1885—1891年任台湾巡抚，制定和推行“台湾产业近代开发计划”是近代台湾开发史上的一件大事。潘君祥《刘铭传洋务思想评议》（《社会科学》1982.12），姚永森，陈万均《论近代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刘铭传》（《福建论丛》1984.5），等论文从刘铭传的治台思想，改革措施，开发功绩等多方面作了研讨。

边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和城镇交通发展，是边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表现。从目前研究状况看，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是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新疆与内地贸易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如王熹、林永匡曾发表了《清代新疆的丝绸贸易》（《新疆社会科学》1986.6）《乾隆时期内地与新疆的丝绸贸易》（《新疆大学学报》1985.4），《清代乾隆年间苏州与新疆的丝绸贸易》（《苏州大学学报》1985.4）等论文十余篇，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此外范金民《清代江南与新疆的丝绸贸易》(上下)(《新疆大学学报》1988.4,1989.1)，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商业往来》（《西域史论丛》第一辑）等，对各自的命题做了很多的综论或分论。

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研究较多集中在旅蒙商和中俄恰克图贸易。近年来，对旅蒙商研究有较大的进展,发表的论文有陈东升《清代旅蒙商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3），牛国祯，梁学诚《张库商道及旅蒙商述略》（《河北大学学报》1988.2）等。中俄边境贸易的研究论文也较多、如许淑明《雍乾时期北方边境贸易新城——买卖城》（《清史研究通讯》1984.1），袁森坡《论清代前期的北疆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2),宿丰林《清代恰克图边关互市早期市场的历史考察》（《求是学刊》1989.1）等。

云南、西藏的茶叶市场的发展与变化是边疆贸易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发表了陈一石《清代滇茶述略》（《西南民院学报》1989.3），陈一石、陈泛舟《滇茶藏销考略》（《西藏研究》1989.3），陈一石《印茶侵销西藏与清王朝对策》（《民族研究》1983.6），李培林《近代西藏茶叶市场之争与云南茶叶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1.4）等论文。

清朝对沿海的贸易政策及台湾与内地的贸易关系是海疆开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吴育频《清朝前期的沿海贸易政策》（《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90.3），张忠民《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政策》(《经济问题研究》1988.1），韩振华《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3），等论文对这个方面作了探讨。

近年来的边疆开发研究中，城镇建设和交通开发的研究引起学术界重视。梁志忠《清初东北的城镇》（《北方文物》1988.4），王佩环、赵德贵《清代三姓城的勃兴及其经济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7.1),许淑明《清前期黑龙江地区的三座新城——瑷珲、墨尔根和齐齐哈尔》（《清史研究通讯》1988.3）等论文对东北地区城镇的兴起及其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作用进行了研讨。方裕瑾《清代邮驿制度概述》(《历史档案》1982.3),丛佩远《清代东北的驿路交通》（《北方文物》1985.1），孟宪振《清初吉林至瑷珲驿站考》（《历史档案》1982.4），金峰《清代外蒙古北路驿站》（《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4），《清代内蒙古五路驿站》（《内蒙古师院学报》1979.1），《清代新疆西路台站》（一二）（《新疆大学学报》1980.1.2）等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清代东北，蒙古和新疆地区交通的发展。

四、人口迁移、遣犯流人及生态环境与边疆开发关系研究

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是边疆开发的重要前提。近年对边疆地区人口迁移的研究有较大的进

展。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虽着眼全国，但对当时人口流向集中的蒙古、新疆、台湾、云南等地情况也多有涉及。近年出版的人口史、移民史专著如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李德滨、石方《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清代边疆地区人口状况及迁移历史均占有较大比重，其研究方法亦有参考价值。论文方面，则有张岗《清代北方流民对直隶口外的开发》（《河北学刊》1986.3）、刁书仁《试论康乾时期流民出关移垦与东北旗地的变化》（《社会科学战线》1990.3）、朱诚如《清前期关内外人口流动及其影响》（《辽宁师大学报》1989.4）、定宜庄、刘小萌《试论清乾隆年间的东北流民及其对旗人生计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1988年）、路遇《清代山东闯关流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1987.4）、王希隆《清代实边新疆述略》（《西北史地》）、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同上，1987.4），林仁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历史研究》1983.2）等。

遣犯、流人是特殊身份的移民，他们在边疆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参与当地的开发活动。近年来有关东北、新疆的遣犯和流人研究成果较多。梁志忠《清代前期发遣吉林地区的流人》（《史学集刊》1985.4）、李兴盛《清初流人及其对黑龙江地区开发的贡献》和《清代东北被遣成的起义农民》（《学习与探索》1980.5，1985.5）从不同角度探讨流人在东北的流放地点、类型、安置情况及其开发活动。齐清顺《清代新疆遣犯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4.1）则对清代新疆遣犯的来源、安置、活动情况及清政府遣犯政策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近年来生态环境与边疆开发的关系引起史学界的重视。研究热点集中在北部和西北的草原，沙漠和森林。马正林《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4.3）、陈育宁《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6.2）、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的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都认为近代沙漠的蔓延和扩大与清代的过度开垦有直接关系，但也有人对此持不同看法。赵永复《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就认为毛乌素沙地自第四纪以来就已存在，主要不是人为因素的产物。钮仲勋、浦汉昕《清代狩猎区木兰围场的兴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与破坏》（《自然资源》1983.1）、殷晴《新疆的隐忧——开发建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思考》（《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7—8）对滥垦滥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剖析，告戒人们注意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

十年来我国史学界对清代边疆开发史的研究，无论从宏观或微观研究上都有所前进和突破，形势喜人。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对有关成果逐一介绍，但是总的来说，这还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尚有许多不足有待弥补。首先，研究中缺乏总体观念，宏观研究的力作少，区域性、专题性论文多；其次，研究发展不平衡，对东北、新疆、蒙古、台湾的研究较深入，西藏、西南、海南相对薄弱，屯垦贸易的成果较多，人口迁移、城市发展、文化交流方面略显不足，不少空白尚待填补，就时间论，清前期较充分，近代偏薄弱；其三，许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未能吸取，这些都有待今后的不断努力。